



解放前夕那段黑暗的日子,对南京城的黎民百姓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又是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物价暴涨、政治腐败、空前混乱、民怨沸腾,南京城已是个“失控之城”,很多老百姓没钱没饭吃,有的上街要饭,有的敲着脸盆集体抢米店、抢烧饼店,就连鸭子店也一锅端了,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这种局面才平息下来。 快报记者 钟晓敏

兵临城下 南京已是乱城一座



钱变成纸,难民激增,抢劫案频发 热心读者提供

那时 | 物价涨没涨 看烧饼大小

从1948年8月到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原本1元金圆券可买3升米,短短几个月,130元金圆券只能买到一粒米。 “物价跑疯,东西涨价的速度像风一样快!”75岁的徐国梁老人回忆解放前的物价,念起了当年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歌谣:“薪水是个大活宝,想和物价来赛跑。物价只想涨一天,薪水半年赶不上……” 徐国梁祖籍山东,解放前“跑荒”,他和父母流落到了南京,扎根在五所村。为了谋生,父亲盖了一间土房,经营起了一个烧饼店。他对物价的深刻印象,就是从父母每天早上

做的烧饼上得来的。 “一块烧饼原来比巴掌大,最后就剩下掌心那么大了。”徐国梁比划着告诉记者,烧饼就是他衡量物价飞涨的一个“参照物”,“如果烧饼前一天小了,就说明物价涨了。” 在徐国梁的记忆中,每次母亲一买完烧饼,就直奔米粉店,抓紧买面粉,因为迟一步也许价格就涨上去了,等到第二天,第一天赚回来的金圆券有可能连本带利都买不到第二天用掉的面粉了。当时,米粉店流行打这样一个招牌: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 为了抵制通货,老百姓

无奈之下开始拒用金圆券。在市场交换中,大家流行起“以物换物”,大米成了大家的“最爱”。他记得,有人拎大米去理发。 后来,一个烧饼店支撑不了一家人生活,他的父亲就去码头干苦力,父亲不要工资,干一天活要2斤大米,还说:“这个最实在”。 1948年,时任国民党粮食部视察的余仲篪做了一份《关于镇压南京市民抢购面粉》的调查,印证了老百姓老人的回忆。这份调查记载,“1948年的一天,有恒面粉厂派志洪押国字61087号卡

那时 | 汤里有根面 乞丐直尖叫

夕阳下,刘秀珍坐在轮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神色安详。老伴推着她在汉中门市民广场上散步,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夕阳景。 “解放那一年,我才8岁。”刘秀珍说,解放前的事,她大多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件事,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解放前,逃荒要饭的很多,满大街都是的。” 解放前,刘秀珍的父母在城南府西街马巷做裁缝。在她记忆中,这条巷子又长又窄,里面商铺林立。当时,今天的“老字号”刘长兴面馆就是在那条巷子起步的。当时,刘长兴面馆规模很小,只有两间门面,一间用于生产,另外一间用于堂食,里面摆了三四张八仙桌,生意特别好了。“刘长兴家面条很有特色,师傅先把面条下开水锅煮一滚,去掉碱味,再挑起到清水里‘过汤’,然后

放到另外一个锅里煮熟。”刘秀珍说,过面汤倒了也浪费,师傅们把过面汤用一口缸盛起来放在店门口,这成了逃荒的、要饭的“美味”。 “过面汤比白开水浓稠,又不费钱,每天都有很多‘叫花子’排队打汤喝。”刘秀珍说,很多要饭的就守在附近,有一次,有个小叫花子在碗里找到一根面条,舍不得吃,挑起来冲着母亲直喊:“面!面!” 南京市档案馆提供的一份资料证实,解放前南京乞丐多达数千名,这些乞丐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职业性”的,他们不仅专门以乞讨为生,还分了很多流派,比较大的就有莲花落派、大小开罐派、号筒铃铛挂碗派,还有会耍猴。另外一种则是难民营乞丐,他们因临时性困难流浪乞讨,主要是难

民和失业失业人员等。第三种是弱残废型乞丐,他们无家可归、无依无靠而长期流浪乞讨。 随着街上流浪讨饭的人越来越多,“敲着脸盆”开始连敲著名作家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 三毛吃贴广告用的糍糊,睡在垃圾车里,冬天就以破麻袋披在身上御寒的遭遇,引起了广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共鸣。“那个时候,很多父母流行起给孩子们取名叫大毛、二毛、三毛、小毛。”刘秀珍说,弟弟出生后,父母就给他取小名“狗毛”。“三毛机灵,人又善良。”刘秀珍说,长大后她又看过电视剧《三毛》,她分析说,弟弟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小名“狗毛”,大概是因为善。 “三毛机灵,人又善良。”刘秀珍说,长大后她又看过电视剧《三毛》,她分析说,弟弟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小名“狗毛”,大概是因为善。

那时 | 敲脸盆上街 抢大米成风

“1948年9月至12月,南京失业失业人员达37万人。到解放前夕,铁路、工厂遭到破坏,大批裁员、遣散和解雇,很多公教人员和仆役也加入失业失业人员行列,加上涌入南京的难民、流亡学生和散兵游勇等,使失业失业人口增至50万左右……”从南京市档案馆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我们不难看出,解放前失业问题已成了南京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老百姓没饭吃,粮店老板还囤粮,大家就抢。”79岁老人张文韬亲眼目睹过那悲惨状:很多饥饿难耐的老百姓敲着脸盆、簸箕,集体走上街头,先抢米店,后抢烧饼店,后来连鸭子店也一锅端了。 “国民党派兵,警员来镇压。”张文韬介绍,他在珠江路上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宪兵开枪打死人的老百姓更愤怒了,国民党迫于压力,改打鸣枪,但这对饥饿的百姓而言毫无震慑作用,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国民党宪兵开进商店,秩序大乱,押车宪兵于劝阻不听时对空鸣两枪,群众仍不理。此时,警察与卫队稽查所官兵兵至,当场拘捕抢粉者男女13人,夺回面粉35袋。” 1948年下半年,南京市男女老幼,土农工商全部走上街头,抢米糊口。国民党粮食部档案1948年11月11日记载:“11月9日,南京市抢米风潮从石鼓路裕丰米厂被抢开端后,蔓延到了全市。除下关区外,抢米饥民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一伙不等,见有米店即将店门冲开,一涌而入,强行取走。抢米人群中男、老、幼、土、农、工、商各色俱全,宪兵干涉亦未见效。幸今(11日)晨起,中区各店部分已有每升3元余之平价米出售,抢风稍歇。” “下关区去抢米,中华门外大成一家4石,三牌楼泰和祥(详情未悉),永盛祥500石,祥记石余。珠江路丰余100

那时 | 为了拉工程,贿赂“总统府”

“解放前,老百姓日子太苦,国民党太腐败!”张正明老人认为,国民党垮台有历史必然性。 张正明老家在江都,1944年10月,年仅14岁的他从江都乘一叶扁舟到镇江,接着爬了一列敞篷火车,颠簸了近2小时,辗转来到南京,慕名去珠江路油漆花桥旁的“吕复兴油漆作”当学徒,这一干就是4年。回忆那段艰苦岁月,79岁高龄的老人感叹:“旧社会不是人过的日子!” “徒弟徒弟,三年晦气,不是挨打,就是扫地。”张正明回忆学徒时,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生火烧上两大锅稀饭。煮稀饭时米放多了一点,老板会教训他,米放少了,师傅们又怨他。来中时,他左右为难。那时,师傅们吃了他烧的稀饭,编了一条顺口溜:“一吹三层浪,一嗅九条沟,不是萝卜来打坝,一直漂到后湖洲。” 早晨吃稀饭,中午就吃“汤饭”。初一、十五“逢斋”,大家才能有肉吃。当时,师傅们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感叹吃肉难:“早盼晚盼,不容易盼到初一十五能吃肉,老板把肉切得纸薄纸薄,一阵大风把肉刮到北极圈,也没吃着。” 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却把大把的金银手送给国民党高官。张正明摇头苦笑,学徒4年,他还兼任给国民党高官“行贿”重任。 “吕复兴油漆作”相当于现在的装潢公司,常给国民政府的建筑做装潢,南京“总统府”门楼上的“总统府”三个字的牌匾就是由“吕复兴油漆作”做的。 他介绍,“吕复兴油漆作”老板为接下总统府的有关装潢工程,经常差他送钱进物。“1947年国民党大会代表选举前,我就不止一次给国民党大会秘书处科长送去。”张正明说,究竟送了多少钱?他从没拆开细数,一共送过多少?他也记不得了。“反正每次投标前,中标后都送。” “柴科后来发大财了,在玄武门附近盖了3层楼的

车一辆,运交邱永兴等9家特粉180袋,车至中华门外时,群众持钞票争购,不得已乃将粉车开至养虎巷警察所办理,群众也跟进了警所,由巡官王保国宣布有营业执照者准购特粉1袋。此时有52家有执照,60袋粉可勉强应付,警所外停立百余人多不愿离去,与武装警员争闹不休。待下午7时赶到夫子庙时,发现运交文德桥3号永和号、市府路29号之一新福记两家特粉40袋全被民众抢购,秩序大乱,押车宪兵于劝阻不听时对空鸣两枪,群众仍不理。此时,警察与卫队稽查所官兵兵至,当场拘捕抢粉者男女13人,夺回面粉35袋。” 抢米风潮甚至延续到解放当天。4月24日,《中央日报》上就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全市一片抢风,市场已陷停顿》。文章上写,“各商店都没有开门做交易,汉中路及中央路一带,米店多数被抢……均被一般贫民抢空,所有逃离市民低价出售物资,大米一石,袁头二枚,绿柱丹面粉仅卖1元1袋。其他物资如香烟、棉纱、棉布等喊价极为低廉,均无人问津……” 除了对大米情有独钟,还有人抢金银首饰。翻开已经泛黄的报刊旧闻,有关抢劫案件遍地开花。“这种局面到了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平息了下来,中区各店部分已有每升3元余之平价米出售,抢风稍歇。”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被糟蹋了,脸上多难看啊。”王云山老人介绍,李春梅老人与儿媳住在应天花园,享受天伦之乐。不过,一提起解放前,老人便神情黯然,感叹:“哎呀,那个日子苦啊,3天3夜都讲不完。” 那时,李春梅与父母及4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沙洲。父母租了地主5亩地,可一年忙到头,过年时都没米下锅。后来,父母被迫无奈将她送给了一个姓徐的科长送过去,“反正,每次我们老板一接到工程,就让我去送。” “国民党中党部副科长姓杜,他这个人很厉害。”回忆到这个杜科长时,张正明眯起了眼睛,娓娓道来。当时杜科长和很多老百姓一起住在玄武湖附近,有一次,老板想巴结这个杜科长,就让他扛一张小桌子给杜科长送去。不料,他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家,“哎呀,他家只有一间房子,还是土墙,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毛竹搭的一张床……” 解放后,张正明听中央党部保洁员段师傅说,杜科长其实是一名地主的儿子,在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很多人要冲进中央党部抢东西时,杜科长掏出手枪,维持了秩序,帮共产党顺利接管。



1949年4月23日早晨,大街上的人比平时少一些,16岁的王华福还像往常一样,挑着担子去上新河卖豆芽。时光荏苒,转眼一个甲子过去了,坐在朝天宫广场上晒太阳的他不禁感叹:那一刻,他做梦也没想到南京城已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 南京解放前夕,普通市民、黎民百姓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4月23日,他们是以何种心情迎接解放的,是心中忐忑,还是满怀期待?今天,身处一个全新时代的我们,走访了一位位鬓角已白的老人,他们没有显赫的身分,他们的故事也很普通,但他们却勾勒出了一副副人们在经历风云激荡、家国变迁时最本真的“解放表情”。 快报记者 钟晓敏

解放那天 所有惶恐瞬间消散



解放军占领南京,老百姓心里的恐惧随之荡然无存 快报记者 路军 翻拍

解放前夕 他们忐忑

父母抓紧嫁女儿 结婚启事到处是

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奸淫掠夺的恶行,在广大百姓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75岁老人王云山介绍,解放前他住在江东路一带,他清晰记得,日本人见到大姑娘,会兴奋地大叫:“大姑娘挺好好挺好的!” 解放军渡江消息传来时,有一部分老百姓心中相当没底,解放军究竟如何?王云山老人回忆,当时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污蔑共产党,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一时间人心惶惶。 “害怕被糟蹋,很多人家把女儿送到乡下去了。”王云山介绍,比他大1岁的姐姐成了全家人的心里负担,早在解放前20天,父母就趁黑夜将姐姐护送到乡下一个亲戚家,叮嘱姐姐好好藏起来,千万别抛头露面。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被糟蹋了,脸上多难看啊。”王云山老人介绍,李春梅老人与儿媳住在应天花园,享受天伦之乐。不过,一提起解放前,老人便神情黯然,感叹:“哎呀,那个日子苦啊,3天3夜都讲不完。” 那时,李春梅与父母及4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沙洲。父母租了地主5亩地,可一年忙到头,过年时都没米下锅。后来,父母被迫无奈将她送给了一个姓徐的科长送过去,“反正,每次我们老板一接到工程,就让我去送。” “国民党中党部副科长姓杜,他这个人很厉害。”回忆到这个杜科长时,张正明眯起了眼睛,娓娓道来。当时杜科长和很多老百姓一起住在玄武湖附近,有一次,老板想巴结这个杜科长,就让他扛一张小桌子给杜科长送去。不料,他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家,“哎呀,他家只有一间房子,还是土墙,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毛竹搭的一张床……” 解放后,张正明听中央党部保洁员段师傅说,杜科长其实是一名地主的儿子,在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很多人要冲进中央党部抢东西时,杜科长掏出手枪,维持了秩序,帮共产党顺利接管。

解放前夕 他们害怕

全村上百号人 带被子躲进菜地

一头短发像罩了一层白霜,一双眼睛深深的陷了下去,一双粗糙的手布满了一条条蚯蚓似的血管,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像是记载着李春梅老人81年来的千辛万苦。李春梅老人与儿媳住在应天花园,享受天伦之乐。不过,一提起解放前,老人便神情黯然,感叹:“哎呀,那个日子苦啊,3天3夜都讲不完。” 那时,李春梅与父母及4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沙洲。父母租了地主5亩地,可一年忙到头,过年时都没米下锅。后来,父母被迫无奈将她送给了一个姓徐的科长送过去,“反正,每次我们老板一接到工程,就让我去送。” “国民党中党部副科长姓杜,他这个人很厉害。”回忆到这个杜科长时,张正明眯起了眼睛,娓娓道来。当时杜科长和很多老百姓一起住在玄武湖附近,有一次,老板想巴结这个杜科长,就让他扛一张小桌子给杜科长送去。不料,他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家,“哎呀,他家只有一间房子,还是土墙,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毛竹搭的一张床……” 解放后,张正明听中央党部保洁员段师傅说,杜科长其实是一名地主的儿子,在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很多人要冲进中央党部抢东西时,杜科长掏出手枪,维持了秩序,帮共产党顺利接管。

解放当天 他们坦然

像往常一样 上街卖豆芽

今年88岁高龄老人汤诚,解放前在文昌巷做买卖,两条腿的鸡鸭鹅,没有嘴的鸡鸭鹅,他都卖。 4月23日晚,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都撤了,城市的治安陷入真空,街上不时有抢劫案发生。他叮嘱家人说:“这一天,千万不要到街上。” 解放当天,他依旧带着一家人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未像往常一样出去做生意。直到一周后,他才出门,不别人问他什么,他都一言不

解放前夕 他们害怕

全村上百号人 带被子躲进菜地

下了南京城! “不得了,共产党要来了!”有人一声大喊后,很多人跑下来大声求饶,“先生饶命,先生饶命。” “乡亲们别怕,我们是解放军,是来保护你们的。”李春梅说,当时解放军大声安慰大家“别怕”。回忆到这里,李春梅老人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竖起大拇指称赞:“解放军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原来,解放军帮她拎过一桶水。虽然只是一桶水,但在老人心目中,意义却不不同。她大伯的一个儿子害怕国民党,有个国民党军官招呼叫他帮忙端个脸盆,他却吓得掉头就跑,结果被一枪打死了。四叔死得就冤冤枉了,四叔个子高,梳了一个“西装头”,国民党认为四叔这副打扮像新四军,对他连开了3枪,枪枪击中要害。 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她最害怕过日子。“兵祸过,礼包破。”李春梅老人说,国民党部队来了,总要搜刮一些民脂民膏,即使在她家连一张床都没有的情况下,有一次,国民党还跑进她家,想拿点东西,最后败兴而归。

解放当天 他们坦然

像往常一样 上街卖豆芽

一夜炮轰之后,街上的人明显比往日少了一些。不过,他记得当天他还是把豆芽全卖掉了。 “那有什么害怕吗?”家住红花地小区的77岁老人余贵英回忆解放当天情景,肯定地说:“我没人家那种害怕的感觉。”她介绍,解放那一天,她在太平南路上看到一支解放军队伍往总统府方向走去,感觉特别“稀奇”,她和5个弟弟妹妹,一个拽一个,跟在队伍后面“看热闹”。 “早上还是有一点紧张,到了中午就不怕了。”家住老城南的李伯伯说,解放当天上午,他所在的“大兴无杂货店”关门停业,广州路一条街上其他店铺都歇业了。“解放军走累了,就坐在店门口,喊他们喝水也不喝。”他说,发现解放军“不招惹”老百姓,大家心情逐渐放松了。那天,他还奔到励新剧场看了一场《南北一家》。记者查阅了当天的报纸,发现南京各大影院

都照常营业,大光明在放《董小宛》,大华上映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首都电影院在放《离奇曲折,别出心裁》的探案《杀妻报》。市民的娱乐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4月24日《中央日报》一篇《天亮前后》的报道,是这么形容4月23日的,“一夜炮声之后,南京城醒过来了,市民忘记了那可怖的战争恶梦,朝阳映红了石头城,人们恢复了平静……国民党军队、士兵、警察纷纷撤退,市民多以惊奇的眼光看他们零零落落没精打采地拖着疲惫的步伐向中山门外退去……撤退声中,电讯局、邮政局、电厂的员工们最镇静,他们照常工作,电讯局局长报告‘民治安维持会’说,他们员工一个都没有走,电厂继续供应水电,邮政局自愿供给邮车、摩托车,送达维持治安的消息。报时台人就每隔半点钟报时一次。南京城内的一切,都井然有序。”

解放以后 他们欣然

看不起“土八路” 的人参军入党了

王华福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当天卖完豆芽回家之后,家里已经住上了解放军! “我的心当时‘咯噔’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共匪’怎么住到了我们家?”王华福回忆,为了不让解放军看出他的心虚,他故作镇定,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家门。 “解放军打着绑腿,背的是步枪,有的人脖子上还挂着干粮,看上去一副‘土’相。”(感谢南京市档案馆给本文提供大力支持)



解放前夕,《中央日报》上满眼是订婚结婚启事 快报记者 施向辉 翻拍